

中國經濟問題講話

新知叢書

第一輯・第七種

錢俊瑞
徐雪寒
王漁邨
姜君辰
駱耕漠
合著

新知書店出版

新知叢書

第一輯・第七種

中國經濟問題講話

錢俊瑞・徐雪寒・王
漁邨・姜君辰・駱耕漠 合著

新知書店出版

新知叢書 第一輯・第七種

中國經濟問題講話

◀實價三角五分▶

著 者 錢俊瑞・徐雪寒・王
漁邨・姜君辰・盼耕俊

發行者 新 知 書 店

漢口江漢路聯保里
廣州教育路七十號
長金衡常襄龍
沙華陽繼陽水

印刷者 民光印刷公司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民國二十七年八月二十日初版

序

這幾年來，跟着幾個朋友學習着中國經濟問題，自己感覺到研究的中心，前後有相當大的轉變。大概在一九三五年以前吧，我們以社會改革為目標，來研究中國經濟。以為資本主義在中國不能有正常的發展，因之相當強調着整個改造的要求。這在基本上，我認為到現在還並未錯誤。不過從一九三五年以後，敵人加緊侵略中所引起的國內外條件的變動，使我們研究的任務也非得改變不可。就是要求建立起以抗敵救亡為中心的國防經濟。

這個改變，實際上是把前一時期的要求，更推進一步，達到解決問題的實踐階段。因之，並不是在根本點上取消前者。國防經濟的研究，更非一時的利用的政策了。

適當的問題雖則提出了，但是並不曾被好好地完成，甚至不曾去要求完成。一年多來，市場上所出現的，還大都是一些較為零碎的應時應景的關於經濟問題的文章，而把經濟上殖民地化的複雜過程，中國金融資本控制力的加強及其轉化的內容、限度和社會意義，各社會階層關係的變化，以及以抗敵為中心任務的經濟準備方案的研究等等切要問

題，竟常常被忽視。甚至對於不正確的經濟理論和實際運動的批判，這一二年來也顯得非常不夠。

本書的文章，大多都寫於一九三六年下半年，恰好如實地表示出這個研究時期的許多特點。在這裏，我們研究的態度有些變更了，問題是被提出來了，但問題的答案却還是十分不夠。這也正足以表示把握實踐的困難吧。

然而我以爲本書的出版還是有用處的，它是一本比較扼要地研究現階段中國經濟的入門書，指示正確的研究方法，提供基本的統計數字，對讀者不會沒有幫助。書中大部份文章是中國農村月刊上發表的『中國經濟講座』，它們本來就比較有系統。這次新知叫我來加以編集，對每一篇都曾經有相當多的修改和補充，使材料更充實些。同時其中第二第三兩講是我自己特地新寫的，因為這樣可以更加完整一點。

爲了完成本書第一講上所提出的要求，我們還希望許多研究者和學習者作更切實的努力！

徐雪寒

一九三七年塘沽協定紀念日於南京

目 錄

序

第一講 目前研究中國經濟的目標…………… 1

第二講 列強對華投資問題

一 強列對華投資簡史 ……………12

二 各國對華投資的陣容…………… 16

三 日本投資勢力的躍進…………… 20

四 結論……………25

第三講 中國金融問題

一	中國金融組織的演變·····	27
二	中國金融資本的特質·····	30
三	近年來的中國金融問題·····	35

第四講 中國財政問題

一	什麼是財政·····	41
二	現在中國的財政是怎樣的·····	44
三	抗敵時期的財政怎麼辦·····	51

第五講 中國貿易問題

一	國內貿易與國際貿易問題·····	55
二	中國國際貿易的特質·····	57
三	列強對華貿易戰的新趨勢·····	60
四	中國國際貿易與國民經濟·····	62

第六講 中國工業問題

一	中國工業的發展過程·····	65
二	列強資本的機能·····	67
三	殘壘自守的民族工業·····	70
四	民族危機與民族工業·····	75

第七講 中國農業問題

一	中國農業的特殊性·····	78
二	中國農業問題的全貌·····	79
三	中國農業問題的徵結及其動態·····	82
四	今後的救濟方策·····	86

第八講 中國交通問題

一	中國的交通事業·····	88
二	喧賓奪主的航業·····	91
三	突飛猛進的鐵路·····	94
四	一日千里的公路·····	97
五	天下三分的航空·····	98

第一講 目前研究中國經濟的目標

——我們要研究促成全民抗戰和保證抗戰勝利的社會經濟基礎——

在今天中國正是由一個半殖民地急速變為殖民地，同時全國規模的對敵人的武裝抗戰快要爆發的時候，我們來研究中國經濟，到底應當而且必須研究些什麼呢？一句話說完：我們要研究促成全民抗戰和保證抗戰勝利的社會經濟基礎，詳細點說，我們第一要研究：在日本帝國主義對華軍事政治經濟文化侵略之下，中國的各種社會成份，那些一定會參加抗敵救亡的陣線，那些可能參加這條陣線，而那些定然會參加敵人和漢奸的陣線；同時，凡是與中國國民經濟有相當關係的許多國家，例如英美法蘇德意諸國，那些可能成為我們抗戰的友邦，那些可能成為敵人的與國。第二我們

要研究中國現有的資源和生產裝置應當怎樣配合着全民族的抗敵戰爭，進行必要的開發和動員，來保證抗戰的勝利。

有一些部份中國的『正統派』經濟學者，到今天只在那裏背誦亞丹斯密里嘉圖的原理，捧着馬爾薩斯人口論的講義，跑上講台、跑下講台。這少數的先生們不是有意地在替我們民族的敵人作理論上的辯護，便是無意地作成了民族敵人的俘虜。這種現象當然是可恥而又可悲的；然而這種可恥和可悲的現象却有它一定的社會根源，那些『裝金』了的經濟學者到今天還沒有接觸到日本帝國主義對於中國大衆瘋狂的掠奪，到今天還沒有聽到和見到中國大衆救亡的呼聲和行列，他們的利益還能安放在銀行和最高學府裏面。他們今天所要求的只是如何在『滔天皇恩』之下，讓他們的金屋殿堂繼續存在，因此他們願意捧着那些經濟學上的陳言爛說，來討好敵人，包庇自己。他們用馬爾薩斯的人口論來證明敵人的侵佔我領土，虐殺我人民之爲合理；用自由貿易說來解釋敵入侵奪我市場，實行武裝走私，也是一種『科學的行爲』。他們否認貨幣權爭奪的理論，來掩護日本和其它帝國主義對於中國財政金融的進攻；他們又用經濟發展程度決定民族興亡的機械理論，來證明敵人滅亡中國是『天演公理』，而中國民族的淪亡也是必然的歸宿。我們知道那些稍有『良心』的學者雖則可以不看到東北四省的淪陷，可以

不看到華北內蒙的被敵人武裝佔領，可以不看到幾千萬同胞的被人奴役和屠殺，然而他們不能不看到平津學校的被人勒令遷移，華北各校校長和教授的被人驅逐；因此他們也就『不禁有動於中』，背棄他們一向保持的謬說，同情於救亡的正確理論和行動。然而另外竟有些恬不知恥的名流學者，在這種情況之下，竟還能運用其腐朽的經濟理論來奉迎敵人的意志。某博士的中日經濟提攜論，便是著名的例子。

另外有一部份經濟學者，他們往往滿足於背誦新政治經濟學的法則，只想努力研究商品價值，資本構成，生產過程乃至地租理論。等到他們一接觸到現實問題，不是感到頭痛，便是覺得生疏，他們往往不願參加實踐的過程，增進和糾正他們對於現實的認識，結果他們所習知的理論，就變成死板的教條，而無補於中國經濟問題的解決和現實的改造。

此外，國內還有一部份經濟學者，他們站在科學的經濟學的立場，在發掘中國社會機構的內層，確定中國社會的性質，由此而說明中國社會改造的方向、任務、和動力。這種可敬的工作，對於中國求取解放的大眾，的確已經有了不可抹殺的貢獻；同時在中國學術界上也已經樹立起輝煌的界碑，然而在今天，當我們的民族敵人正在張牙舞爪，滿想一口氣把中國吞滅，中華民族已經站在不求生存便是立即死亡的最後關頭的時候，這些學者在這種研究領域中的努力，

是不過已經算足夠了呢？

我們說，還沒有，而且差得還遠。第一，他們還沒有把國內社會改造和民族解放的任務正確地統一起來，尤其是還沒有把民族解放的任務提到徹底解決中國問題的第一位。這不僅是個疏漏，而且是個很大的錯誤。我們試問：在目前，中國正從一個半殖民地變成殖民地的時候，還有什麼會比爭取民族的獨立和解放，更加神聖，更有決定的重要性呢？我們能設想在最大的民族敵人沒有給我們擊潰以前，我們能夠求得全般的社會解放嗎？我們知道，這是決不可能的。恰巧相反，我們主要的民族敵人一天沒有消滅，他們對於我們的生存權利便一天剝奪一天，他們對於我們要求解放鬥爭的壓迫，便一天兇過一天，因此我們就沒有理由也不可能來放過我們民族最大的敵人，關起門來大談其社會改造的工作。當然我們在這裏又決不能機械地把民族解放的任務，高高地掉在半空，跟社會改造的內容隔離起來。我們應當了解民族革命和社會改造兩者之間，有其有機的不可分的聯繫。我們更應當了解，今天在半殖民地的中國，民族解放戰爭乃是完成內部社會改造的另一種形式。所以，我們知道，社會改造一定要跟着民族革命向前邁進；同時民族革命一定要社會的改造來充實牠的內容，保障牠的勝利，因為脫離社會改造的民族革命只是殖民地一部份有良心的統治階

層的幻想；牠是得不到大眾的參加和擁護的，因此也就是沒有動力的死東西。

我們不能否認，過去一部份經濟學者所以不談民族解放，的確是因為他們在有意無意之間，已經受了關於民族問題的偏見的影響。他們怕談民族獨立與自主的問題，為的是他們怕被人家『貶』做民族主義者。他們怕說民族革命，為的是他們怕被人家罵做抹殺社會革命的混蛋。他們甚至不敢設想中國是一個國家，是一個民族，他們『科學的頭腦』命令他們只能設想中國只是一個『社會』，一個由幾個階級和階層組成的社會。實際上這種了解可說是『知其一不知其二』。中國是這麼一個社會，這是不錯的；然而中國却同時又是一個民族，又是一個具備着各種必要條件的國家。如果有人只認識到民族是個整個，只知道誇揚自己民族的優點，竭力要造成本民族對於別個民族的壓迫，那末他們只是侵略的民族主義者，他們跟求取民族的獨立和自主是無關的。同時如果有人只能抽象地了解國家是超乎一切的權力，竭力想法擴充本國的領土，發揚本國的風光，那末他們只是偏狹的愛國主義者，他們跟維持國家領土和主權的完整，也是毫不相干的。當然，無論侵略的民族主義者也好，偏狹的愛國主義者也好，他們都承認侵略是合理的行為，因此他們生長在帝國主義國家，便是徹頭徹尾的侵略主義者，而一到殖民

地半殖民地，却又往往搖身一變，成為投降主義者的尾巴。

我們當然願意那些偏狹的民族主義者和愛國主義者能夠為我們民族的獨立和祖國的解放而努力，而奮鬥，然而我們更希望他們能夠擺脫那種狹義的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的觀點，站到正確的把民族解放和社會改造的任務看做密切、不可分離的觀點方面來。我們不怕承認中國是一個民族，恰恰相反，我們還誇耀我們這個古民族的光榮和優越，我們還熱愛我們的祖國；我們要憑着這種誇耀和熱愛，來摧毀我們民族的內外敵人。我們認為，我們光榮的民族，我們偉大的祖國，在這一世紀來已經受盡帝國主義者獸性的踐踏，和國內奸細們無恥的污辱。我們固然看到，假若一個民族正在壓迫別個民族，那末這個民族本身一定不會是自由的民族；同時我們更能看到，一個被壓迫的民族，那就更談不到自由，反之，牠是受到內外敵人的雙重壓迫，因此被壓迫民族的大眾，首先就應當團集整個民族的力量，打擊內外的敵人，以求自身的獨立與解放。

沒有全般地充分地把民族解放的任務擺到第一位，同時沒有把這種任務和社會改造的任務有機地聯繫起來，這是目前一部份進步的經濟學者所犯的第一個毛病。

第二，那些經濟學者在中國社會經濟的性質的研究上，的確用過很大的功夫，特別從兩次熱烈的論戰——中國社

會史論戰和中國農村社會性質論戰以來，一般研究中國經濟的朋友們對於中國經濟的結構，確乎已經具備了相當的認識。這種研究的成果，一面是最近十年來社會實踐的結果；同時又使這種實踐推進了一步。

然而不幸得很，我們研究中國經濟的朋友們因為研究材料的缺乏，特別是因為自身實踐的不夠，對於最近時期內——或是說，從一九三一年以來的社會經濟的變化，並沒有給以正確的評價。在這時期，中國正從一個半殖民地變向完全的殖民地。這種情勢的急轉直下，已經使得中國社會的各個階層起了很大的分化，各個階層之間的對比也有很大的變化；這種分化和變化對於反帝國主義統治的民族陣線的建立，可以說是非常有利的。

首先我們要說一說民族資本的陣營裏面所起的變化。過去我們認定：外國資本強烈的壓迫，使得我們的民族資本，失去獨立發展的可能；同時國內革命勢力的發展，又剝奪了民族資本反抗外國資本和削弱封建勢力的最後勇氣；結果我們的民族資本為要維持其豐厚的利潤起見，為要保證牠自身的存在不受致命打擊起見，就很自然地向外國資本投降，向封建主義妥協了。

這一種對於中國民族資本的估量，到現在是不是還算正確呢？是的，這種估量在基本上還是正確的，然而估量得

並不夠，特別在政治的意義上是不夠的。我們知道，從一九三一年以來，中國所受日本帝國主義在軍事上、政治上和經濟上的進攻，已經使得整個中華民族的生存碰到了最後的危機，這其間大部份民族資本家也早已感到致命的威脅。不消說得，日本的資本靠了牠雄厚的軍事政治力量，向中國國民經濟進攻，結果民族資本的陣營，在他們沒有重新英勇地參加廣大的反×民族陣線之前，只有被打得七零八落，毫無存在的餘地。在另一方面，民族資本買辦化的必要雖然增加了，可是，買辦化的可能却在一天天減少，因為第一，日帝國主義對於中國的統治一天天趨於獨佔，其他帝國主義已經遭到最後的排擠；第二，日帝國主義對中國的統治一天天採取直接統治的方式，買辦資本的功能已經在一天天縮小。這樣中國民族資本在牠主觀上已經祇有死路一條。

在這種情勢之下，中國民族資本，甚至於一小部份的買辦資本（特別是那些給日本帝國主義以外的帝國主義謀利的買辦資本），對於日本帝國主義的進攻，可能不立即投降，而且有參加整個民族反×陣線的可能。日本在華的猖狂走私，迫得全中國的民族資本家不得不起來作最後的吶喊，這不是明顯的例子嗎？

其次，我們要說到農村中間的地主和富農。不錯，中國的地主和富農到如今還是用着半封建的剝削方式（富農有

一部份是用資本制的)收奪下層農民的血汗,特別是地主,他們還是國內封建勢力的主人翁。然而我們單是這樣估量是不是夠了呢?不,還是不夠的。在日本帝國主義對於中國的掠奪正在猖狂進行的時候,中國的地主,特別是富農,是可能起着某種程度的反抗作用的。當日本的軍閥和資本家搶到了我們的東北四省以後,一面實行大規模的武裝移民,一面便隨意沒收當地人民所有的土地。東北的地主和富農在這裏所受到的損失和威脅,使他們部份地可能同情甚至參加當地大衆對日本帝國主義的抵抗。而現在,在綏遠,在察北,在冀東,在河北,甚至在寧夏、山西、福建等地,日本都隨意在搶奪和強買土地,建造飛機場和軍營,或經營植棉場,鴉片田等,這無疑也會威脅到地主富農的身家性命和地田房屋。因此關內的富農,他們的經濟狀況一天天在惡劣了,同時他們以小資產者的資格可能蘊藏着一種熱烈的愛國情緒,而參加反抗國外民族敵人的民族陣線。

所有這些,我們前此都沒有周詳地估計到,而這種新的估量,對於目前正在進行着的決定民族存亡的決鬥,却有非常大的意義。因此我說,我們的經濟學者對於最近期內中國社會成份的比重及其地位的變化,並沒有去充分的估計,去充分地把具體材料加以整理,確是一個很大的缺點。

第三,我們過去研究中國經濟的朋友們,對於具體的